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〇九期 ——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07d)

---

- |        |   |      |
|--------|---|------|
| 【研究评论】 | 一面之词的价值和偏颇：读《李作鹏回忆录》                              | 宋永毅  |
| 【史海钩沉】 | 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然发生的武斗——1967年8月4日<br>上海的砸“联司”武斗是否王洪文预先策划 | 李 逊  |
| 【口述历史】 | 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中）                                | 卜伟华等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评论】

一面之词的价值和偏颇：读《李作鹏回忆录》

• 宋永毅 •

随着《李作鹏回忆录》最近为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当年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幸存的主要成员的回忆录也算是基本齐全了。虽说这些当事人的回忆都是一面之词，但我们要重构的文革真相，绝对应当是完整的、多维的，也必然是复杂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视和分析这些一面之词的价值和偏颇。

#### ◇ 揭示几个老师的文革真面目

在中共的官史中，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贺龙、陈毅为代表的军队老帅们一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文革中更一直是保护老干部、和“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的。读《李作鹏回忆录》解放以来的部分，恐怕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例便是解放初期叶剑英对陈光将军（原四野副参谋长，当时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蓄意陷害。陈是从红军时期就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共战将，但因为他和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在解放海南岛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并发生了争吵。叶剑英便在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的支持下，以完全莫须有的“通敌”、“外逃”等罪名关押了他，以致他于1954年在软禁期间病逝。或许是因为这些手法和后来把李作鹏作为“林

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来搞时同出一辙，李对当年自己被迫地参与这一阴谋有着较为真诚的忏悔。在文革初期，叶又是陷害罗瑞卿的三人小组的组长。据李的回忆：叶对于和他不同派系军队干部，也同样是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例如，因为他在海军支持苏振华，就想像搞罗瑞卿那样搞掉海军司令萧劲光。叶还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一起，试图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批判罗瑞卿转为批判李王张（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另一个积极参加文革的老师是徐向前。他因为被毛提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立刻投桃报李地邀请了江青为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徐和苏振华不是一个派系，他又是军内打到苏振华和所谓的“贺龙政变阴谋”的积极推动者。即便是文革中被打到较早的贺龙，其实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据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回忆，他当时利用林彪生病，他在文革初期还主持军委常委的便利，也确实有在海陆空三军中全面安插自己派系将领的企图和动作，这才导致他和林彪发生全面的冲突。关于他们在文革初期直接迫害的不同派系的军队干部，仅周恩来1968年12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二月逆流”时指出的就有杨勇、赵尔陆、刘贤权等多人。总之，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老师和林彪一系及江青等人的矛盾，绝非是要不要搞文革的矛盾，而是如何各自利用文革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冲突。只是后来文革不断地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搞到了他们头上，他们才出来有所反对。否则，他们都绝对会继续津津乐道于文革的“春秋无义战”之中。

#### ◇ 对罗瑞卿事件较为客观的描述

近年以来，有些研究者为了达到为林彪翻案的目的，在1965年年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反党篡军的问题上，不断推卸林彪的责任，以致把此事说成是林彪完全被动地接受毛泽东的最终决定。虽然李作鹏的回忆录没有直接对此进行任何驳斥，但是作为当事人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描述。按李的说法：林彪在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开始对罗是重用的。但1963年前后林彪生病，毛决定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开始向贺靠拢，并常常直接向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邓请示报告。刘少奇曾提出要让罗当国防部长。这就不仅得罪了林彪，还引起了毛的猜忌。

此外，1965年上半年罗授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林彪逼宫要权也确有其事。此事自然引起林彪极大的反感。而当时罗因为大权独揽、专横跋扈，又得罪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师。据李的回忆，1965年秋天林彪就对人说过：“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另外，叶群也早在1965年初秋就打倒罗瑞卿一事给李作鹏打过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叶群还直接布置李作鹏（和王宏坤、张秀川一起）写揭发罗的材料。由此可见，林彪绝非是被动的，而是非常主动地要搞掉罗瑞卿总参谋长一职。其根本原因，其实是罗瑞卿开始不再效忠于他个人。

李作鹏的回忆录还指出：在批罗会议上最为积极、上纲上线最高的是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对罗瑞卿问题作出反党篡军结论的是邓小平。而叶正是在打倒罗后，取代了罗的军委秘书长一职，杨成武即成了“代总参谋长”。从李的回忆录中，读者可以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中共党内、尤其是军内权力争斗的黑暗和残忍。

#### ◇ 不应回避的林立果等人的“五七一工程”

无论是李作鹏，还是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谈到中共按在他们头上的“企图政变”的罪名便至今惴惴不安。一方面，诚然是他们从没有过政变的打算。另一方面，作为思想仍未彻底转变的前中共要员，他们至今仍觉得对毛泽东暴政的政变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例如，在邱会作的回忆录中，他曾提到他看到过一份林立果的类似《五七一工程纪要》式的文件，但不是针对毛

的武装政变而只是企图武力清除江青、张春桥等人。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1971年3月23日至24日，由林立果和他身边的一批青年军官如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多次讨论，最后由于新野执笔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个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计划，尽管最后只是流产于“纸上谈兵”之中。但在以后官方披露的大量这些激进的青年军官们的工作笔记等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一文件不是伪造的。

在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翻案的过程中，正确的做法绝不是回避或否定林立果等人的“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的存在，而应当是解放思想、光明磊落地指出：1）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林彪或黄吴李邱直接参与了这一不成熟的口头计划，无法得出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任何主要成员曾有过武装政变的计划的结论；2）对毛的暴政，林立果和这些青年军官们策划政变有理！《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文件。例如，《五七一工程纪要》列出“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的几点，无不切中时弊：“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等等。事实证明，毛在林彪事件后批准向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他本人以及后来的“四人帮”来说都是个重大失策。毛当时显然过高估计了他自己的所谓威望，过低的估计了老百姓的分析能力。其结果是在精神迷惘、生活痛苦的人们中，点燃了一支火把，成为他们解放思想的开端。

对于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其价值，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指出其偏颇。否则，我们的思维就会又被官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一家之言习惯性地误导到被弯曲的历史图像中去。

□ 原载香港《争鸣》2011年7月号。

~~~~~

# 【史海钩沉】

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然发生的武斗

——1967年8月4日上海的砸“联司”武斗是否王洪文预先策划

• 李 逊 •

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是文革期间发生在上海的最大武斗，震惊全国。文革结束后，所有的资料，包括笔者过去曾经写过的文章和有关书籍，都将这场武斗的起因归结为王洪文的事先策划。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职工谢福喜被“联司”一派打死，上海市革委会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但“联司”没有听从。8月3日，市革委会决定以市革委会和市政法指挥部名义向上柴厂送“公开信”。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卡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委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扣留。市革委会于是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对于以上这段历史，所有的资料基本都是一致的。但是，后面的进展说法就不一致了。按

照已经作为定论的说法，1967年8月3日这天，王洪文召集“工总司”的头头们开会，讨论第二天的砸“联司”行动，当天深夜，在人民广场以市革委会名义召开对“联司”的声讨大会，实为集结队伍，大会一结束，被调集的大批队伍便直接开赴上海柴油机厂去砸“联司”。

当年的武斗指挥者文革后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笔者曾去采访王明龙、叶昌明、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等“工总司”的头头们，当问及他们当时是怎样策划砸“联司”武斗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砸“联司”前夕，他们没有具体开过会策划砸“联司”武斗。笔者查阅所能看得到的他们在被审讯时的交代，发现他们虽然在交代中都承认自己参与了砸“联司”武斗的策划；但是，在哪里策划的，什么时候开的策划会，开会地点，参加人员，这一系列重要内容却都交代得十分模糊。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下发文件《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其中，关于砸“联司”的交代有好几份，分别是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陈阿大、张宝林、王明龙等工人造反派在1977年至1979年受审期间的交代。他们都承认8月4日这天，是王洪文现场指挥指挥，砸了“联司”。但对这次行动具体是如何筹备或策划的，却很含糊，甚至很不一致。

◇ “8·4”行动是谁组织的？

“8·4”砸“联司”行动是谁组织的？从目前所有资料看，都指向“工总司”。

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材料显示，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召开过“工总司”会议，具体布置砸“联司”行动。在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7月所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中，说8月3日深夜11时，王洪文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砸联司之事，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此外，在叶昌明、张宝林在文革结束被清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中，也说8月3日王洪文曾经召开“工总司”会议讨论布置砸“联司”行动。

笔者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另一份资料，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写的《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的交代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8月3日，王洪文和我们开会策划决定动手打‘联司’，由王洪文等人在人民广场开会集合队伍指挥，我和王秀珍、王明龙在据点里值班，负责联络调度人员、车辆。我和金祖敏通知调集了民航地区一些大厂的队伍赶到市革会做包围工作，我还通知了一些区局联络站调队伍到人民广场去集中。王明龙通知交通局调派车子运队伍去上柴厂。从8月3日到4日两天，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我们发动了打‘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不过，同一份资料中，黄金海又说，事发当时他在厂里不知道，但事后“我叫叶昌明讲起这事，才知道是在8月3日晚上在原华山路警备区支左办公室里策划的。”但黄金海列出的参加策划的名单中，除了“工总司”的人，还有徐景贤、王承龙和警备区的李彬山。这个名单似乎不应该是参加讨论如何砸“联司”的，因为后者都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估计他们是讨论市革委会半夜召开的人民广场大会的。黄金海不是当事人，他是听叶昌明说的，准确性打折扣。

也是同一份资料中，张宝林的交代事件也比较模糊。他说自己那天去西郊公园后，经过军代表劝阻“我们又回到了‘888’，以后在王洪文的指示下，以‘工总司’这帮小兄弟为主题，对联司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商议……”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设立的一个不对外的办

公地点。当时“联司”在社会上声势很大，王洪文怕“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设了这个秘密办公点，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简称这个办公点为“888”。

这些当事人出狱后，笔者就“8·4”砸“联司”之事采访他们，他们说法却又不一样了，都只承认8月4日那天，武斗现场确实是“工总司”指挥的；但是不承认8月3日，即人民广场大会之前他们曾经事先有过策划。戴立清和王明龙、叶昌明都说，8月3日深夜人民广场大会之后，一些群众组织直接去上柴厂，是他们自己自发去的，不是“工总司”事先通知他们的。“工总司”事先只通知他们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大会，没有说开会后要去砸“联司”。

王明龙对笔者说，8月3日那天下午，他正在“888”忙着调动车辆，因为当时许多红卫兵说半夜去人民广场开大会太晚，希望有车送他们去，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来了。王承龙说自己调不动车，指责“工总司”独揽调车大权，说车辆应该由市革委会统一调动。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让你王承龙去管吧。他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见王明龙气走，“工总司”在场的其他人：戴立清、叶昌明和陈阿大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前来的市革会军代表劝回“888”。王明龙说自己后来就一直在“888”，人民广场开大会他也没有去，和王秀珍留在“888”值班。这段时间，他们再没有开过什么会，王洪文也没有到“888”来，只有王承龙来了一下，道歉似地说“大局为重！大局为重！”。第二天早上王明龙才知道砸“联司”行动开始了。（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他在8月3日那天下午，跟着王明龙赌气去西郊公园兜了一圈回来后，就一直在“888”，没开什么会，也没见到王洪文，直到人民广场大会，通知他去，他就去参加了，会散后，他又回“888”休息。第二天早上，他才知道已经有群众组织去上柴厂了，他于是马上赶往现场。如果8月3日已经决定第二天要打“联司”，他怎么会在人民广场大会后又回“888”休息，而不去上柴厂指挥现场呢？

叶昌明对笔者说，他们从西郊公园回“888”后，大约已经是晚上8点，以后没有开过什么会，他在“888”值班，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叶昌明还说，他对“工总司”的会议讨论每次都做记录。他工作笔记上只有讨论抓支联总部人员行动计划的记录，没有砸“联司”的讨论记录。“工总司”的其他人：戴立清、王明龙、张宝林、王腓利、黄金海等也都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会议，更别说参加。说他们和王承龙吵架后，跟着王明龙去西郊公园转了一圈回“888”后，与王承龙等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了。

笔者以叶昌明自己写的那段交代质疑叶昌明。叶昌明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我受审查，问到砸‘联司’的事，我那时觉得‘联司’确实是‘工总司’砸的，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没有在具体时间上多解释，不管是8月3日策划也好，8月4日策划也好，反正8月4日砸联司行动确实是‘工总司’现场指挥的，早一天策划，对我来说都一样。再加上希望自己认罪态度好些能减刑，所以就都认下来了，没有去想8月3日策划和8月4日指挥有什么差别。总之，文革刚结束时，我的时间概念很模糊。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8月3日深夜的人民广场大会，事实上起到激化和煽动情绪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广场大会可以说是个煽动砸“联司”的大会。但他们在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确实没有说大会后要去砸“联司”；而且，这个会是市革会召开的，不是“工总司”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会派去的代表，所以马上在半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可能也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总之，“工总司”没有事先调动队伍。从西郊公

园回来后，他们这些“工总司”的人就都回“888”睡觉去了。（笔者2009年3月13日与戴立清的谈话）

笔者认为戴立清、王明龙、叶昌明等当事人说事先没有组织参加大会的人去上柴厂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正如戴立清所说，如果事先策划武斗，王洪文和他应该在8月3日半夜大会后就赶去上柴厂。叶昌明的解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笔者看到的那些清查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等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清查材料中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而他们却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

叶昌明的解释也说得通，因为笔者所能看到的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有材料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但他们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更谈不上王洪文召集他们开会。

笔者为此特地找到当年的“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的头头张振学，问砸“联司”前一天的8月3日，王洪文有没有在卢湾区人武部开过会。因为张振学和卢湾区人武部熟悉，王洪文如果在那里开会，他应该知道。张振学回答说8月3日那天王洪文没有在那里开过会。他自己在8月3日那天倒是在那里召开过会议，但王洪文没有参加，也根本不知道他们开会的事情。而他们开会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联司”打了市革委会代表。

笔者估计，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报告说王洪文在“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开会一事，应该就是张振学开的这个会。不过，如张振学所说，王洪文没有出席这个会，也不知道这个会。但清查报告硬是将王洪文说成这个会的组织者，以此说明砸联司事件是王洪文事先策划和组织的。但清查报告有个明显的漏洞，就是没有列出参加会议者的名字，甚至连张振学的名字都没有。而且所有笔者能看到的说事先开会策划的资料，都没有提到参加会议者具体到底是哪些人，也没有提到戴立清、王腓利、黄金海等这些“主战派”参加。而这些人也都对笔者说，我们是最坚决的“砸‘联司’派”，王洪文开这样的会不可能不叫我们，除非很偶尔的一两次没通知。但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我们从没听王洪文对我们明确说哪一天要打“联司”，也从来没有有什么作战计划。当然打是一直说要打的，但始终没有好好讨论过。

确实，“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在事前都极力主张立即敲掉“联司”。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也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戴立清、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主张立即行动，说不能任“联司”这样闹。王洪文也认为应该解决。（王洪文的话前已引，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但是，因为市革会干部王少庸、徐景贤等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所以“工总司”一直没有具体讨论何时采取行动，也没有制定具体作战方案。

不过，王洪文确实曾多次要求大家做好准备，随时能够调动人员和车辆。王洪文此时下了决心要砸“联司”，而且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会出面行动。王洪文文革后被审查时交待说：（1967年）“5月以后，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提出新的口号：‘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市革会决定做工作，也没做成。7月份‘联司’在社会上闹得很厉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学烧了，烧了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在外滩把汽车给推翻烧了，把‘东方红’派打出厂去，住在市革会33号的地方。社会上少数坏人符合（应为‘附和’——笔者注）‘联司’当时提出的口号。‘联司’这一派实际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实际是打倒一切，反对用老干部。我对这些做了调查，8月3日给他们写了公开信，派三军（海、陆、空）宣传队送去，‘联司’不接受，把宣传队赶出来，摄影机砸坏了，人也被打了。调查后，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当时社会秩序刚恢复些，上海就要乱下去，

革命生产都搞不好。”“我产生这么个想法，这派不解决不行，全市要乱，下决心要砸，从根本上解决。……决定后，市革会王少庸不同意砸‘联司’，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批干部支持我们，王少庸批评了警备区的几个干部，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他要我请示张春桥，我不同意，心想：“张不好表态，对了，错了，我自己负责。”（引自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这个交代的内容是文革专家王年一1992年亲笔抄录后提供给笔者的。省略号是抄件上原有的）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议论上，还没来得及讨论具体步骤和攻打方案。或者，也讨论过如果行动，该怎样分工。但不会是在8月3日这天。而且，即使讨论，也没有定具体行动时间，只是要大家作好准备。前面所引“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以及张宝林所说研究上柴厂地形等，应该都是8月3日之前的议论，或者可能是8月4日砸“联司”时的现场部署。

不过，正如戴立清所承认，即使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没有说去打“联司”，但大会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煽动。大会在深更半夜召开，甚至等不到第二天白天，而且召开时间很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紧急动员大会。

#### ◇ 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将发生的武斗

既然“工总司”总部8月3日没有专门开会部署砸“联司”，那么，8月3日晚上人民广场大会结束后，一些群众组织怎么会去包围上柴厂？

“工总司”的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王腓利等都回忆说，他们当时听说，起因是“联司”（或“支联站”）的卡车故意冲撞市革会人民广场大会散会后的游行队伍，而且将人撞成重伤。

王明龙对笔者回忆，他事后听说，那天大会后举行游行，游到外滩，正遇上“联司”的几辆卡车，双方发生摩擦。众人很气愤，游行队伍中有的厂有车，就开去上柴厂了。

王腓利对笔者回忆，他当时听说，那天大会后，冶金局一些在上海杨浦工业区的工厂造反队，回厂途中在外滩与“支联站”发生冲突，于是直接开去上柴厂。

叶昌明对笔者回忆，首先冲往上柴的队伍是“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下面的造反队，大会结束后他们游行，又在外滩与“支联站”冲突，被撞伤了几个人；而几天前的8月1日，冶金局下的造反队与“联司”在“大世界冲突”中刚死了一人，于是立刻开往上柴厂。叶昌明说自己在“888”听说冶金局有人开去上柴厂，还议论说他们这样做不好，不赞成。

还据“工总司”的谢鹏飞对笔者回忆，8月4日早晨，王洪文听说“工总司”冶金联络站已经将上柴厂包围，大发脾气，说：“又是曹德宏，不听指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闯祸！”

所以，王明龙、戴立清、叶昌明都认为，砸“联司”是个偶然发生的群众的冲动行为。当然，这个偶然行动有必然性，因为王洪文和他们确实一直想对“联司”下手。叶昌明对笔者说：“我们最开始是一直想把‘联司’与‘东方红’联合起来，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联司’越闹越大，还要成立全市性支联总部，大家于是觉得不砸不行，都说只有敲掉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联司’是一家工厂的组织。以‘工总司’这样一个全市性组织去砸它，似乎有点以大压小，师出无名；不像‘支联总站’，是个全市性组织，‘工总司’对它行动顺理成章。‘联司’几次在公安局和政法指挥部前示威，王洪文说，要是‘联司’冲了公安局或政法指挥部，就有理由对‘联司’行动了。但是‘联司’没有冲，我们也只好再等待机会。所以尽管我们多次说

要砸‘联司’，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正具体讨论过行动方案。”（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笔者在文革资料搜集者陈国康先生的帮助下，终于查到了当年的传单小报对叶昌明等所说“联司”冲撞人事件的报道：“‘联司’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卡车发疯般行驶着，朝正在外白渡桥下的我站造反队员扑将过来，顿时，飞旋的车轮碾轧了造反队员的身体，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多阶级兄弟就这样被这一小撮匪徒惨遭伤害了。新仇旧恨心中涌，万丈怒火胸中烧，怒不可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文章刊登在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主编的《冶金通讯》1967年8月22日“专刊”上，题目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同样提到这起卡车有意撞人事件的，还有同张小报上的另两篇文章：《革命英雄谱》，作者是“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人革命造反纵队”；《战地见闻》，作者是“工总司上海耐火材料厂革命造反纵队”。

从这三篇报道可以看出事情发生的大致过程：8月3日深夜大会结束后，一些单位的造反队随即游行，在外白渡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造反队三人被突然冲来的卡车撞倒。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其中一人被撞成重伤，头破血流。肇事卡车撞人之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队员们为这个具挑衅意味的故意撞人行为激怒。3天前，“工总司”与“联司”曾经在“大世界”发生过一场武斗冲突，一人死亡，死者金乃林是上海冶炼厂的工人，正是冶金系统的，“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负责人曹早就恨死“联司”，这下更是新仇旧恨，当即决定，队伍开往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这三篇报道，都与前面引用的那些回忆吻合。

此时，是8月4日早上5点。正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睡觉的王洪文被人从床上叫醒，告之说上柴厂被团团包围了。王洪文立即和王腓利一起驱车去事发现场的上柴厂，同去的共有几十辆小车，都是市革委会和驻上海部队的负责人。这个情景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这也证明王洪文事先不知道冶金局的造反队会去包围上柴厂。如果王洪文事先策划这场武斗的话，他应该在头天半夜市革委会组织的人民广场声讨“联司”大会一结束，就和冶金局造反队一起开往上柴厂。

王洪文到了上柴厂之后，在现场指挥了砸“联司”武斗。王洪文8月4日这天始终在砸“联司”的现场，亲自指挥了这场大武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4砸“联司”确实是王洪文策划和指挥的。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天马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砸“联司”后不久，张春桥有个讲话，提到砸“联司”之事，也说事前没有搞过“作战计划”：“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张春桥1967.10.16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有时，看似偶然的事件，比那些先入为主的固定思维，可能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逻辑，更能



反映历史的随机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必然中的偶然”！

~~~~~

## 【口述历史】

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中）

• 采写：卜伟华 • 徐绥之 • 编辑：卜伟华 • 米鹤都 •

（续 z k 1 1 0 7 b）

◇ 在天安门上

“八一八”的事，是新市委发的通知，几天前就定了的，要每个学校去一个人，到北大附中筹备召开北京市百万群众庆祝文化革命胜利大会。我们学校是袁东平去参加筹备会，去多少人，在什么位置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前一天晚上派车，半夜一点多钟出发。

当天夜里两点钟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参加游行的，一部分是上观礼台的。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走不动了，人们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了。警卫就把他劝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商量一件事。他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跟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每个学校上去多少名额。我们两个学校人数是最多的，每个学校40人。其他学校，有30个的，20个的，10个的。就分了这么几批学校。然后他说，几点几点你们集合，但要求上天安门的人政治上一定要可靠，所有人家里不许有任何问题。

我们这边挑了26个人，留14个名额给在广场上的人。我叫高洪旭下去告诉晓宾，让他来，还点了一些人的名字，让他们组织14个人赶快过来。过了一会儿，高洪旭回来说，出不去，不让出去。因为来不及了，然后我们就上天安门了。

在天安门上，总理告诉我们，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后来，我站在距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还是那条，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其实没有那回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还是与我想象的不一样，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我们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去了，就是骆小海、韩军、宋柏林。主席问他们，你们是谁呀？他们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主席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他们问主席，听说你给我们写信了，我们没有收到呀？主席说，那还没有寄呢。他们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万寿也有疆嘛。

“八一八”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回去以后都很高兴，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

8月份，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中央确实实是支持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确实实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不敢说，我已经团结了大多数人，但我可以说，我确实实是想团结大多数人的。

回学校以后，又一次大的联欢。我们把白天上天安门的情况都讲了。周春晓的发言，显得特别激动，那天她照相时就站在主席的旁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

#### ◇ “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北京二中红卫兵发出了《向旧世界宣战》的“破四旧”宣言，说实话，我毫不感冒。对红卫兵到社会上去造反，我非常不赞成。什么改名字啊，剪喇叭裤啊，砸尖皮鞋啊，我都不赞成。我觉得这个界限不好掌握。从那以后，出了很多非常荒唐的东西，比如要求改成红灯行、绿灯停。还有要求汽车靠左边行走，左派嘛。出了一大堆这类东西。

我们不希望中学生到社会上去，很容易被人家利用，很容易出现政策偏差。界限不好掌握，很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给毁掉。

“八一八”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还是卫戍区白政委，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你们来两个人。我当时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任冉齐，一个是叶侨生。这是大约8月20号左右，在“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之前，活动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一共二十几个人，有几辆摩托车，有一辆吉普车，有人给他们开车。听说有人要去抄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家，他们就去保护。有一次拦住了，有两次抄家的人没来。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回来了。后来我问过任冉齐，他说，记得有那么回事，但具体干了些什么事，他也记不清了。

与此前后，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的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引起很多猜测。大字报开始涉及这些内容了，开始是影射刘、邓等人，到8月22、23号就有直接点名的“大字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还有点周恩来的名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有人转抄出来了。8月24日那天达到顶峰，有张“炮轰……”的大字报，没点名，但明显是炮轰毛的。

8月24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工字厅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9）。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也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对这种严重的情况怎么办？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把这类的大字报都撕掉，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最后决定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后来据说有12所中学的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园，这事我不清楚，因为在清华开会的时候好像只有我是一个中学生。12所中学的人是什么人调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到清华大学的？这些我全然不知。据说那天晚上又打了好多人，让黑帮搬砖，我是看了刘冰（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文章才知道的。刘冰文章里说，半夜，清华附中的人跑到九公寓来，抓他们。我想附中要有

人参加，也应当是由清华大学的人带着去的。

“八二四”事件以后被说成有几个意义，一个是镇压了一些反刘少奇的人，其实那天不是这个意思，是希望内外有别，保守党的秘密。说的最多的是，这个事件是支持刘少奇的人策划的保刘少奇的行动。这个后来也变成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个罪名。王力、戚本禹到清华附中说，刘少奇镇压你们红卫兵，你们还去给他撕大字报。

那天打了很多，包括万邦儒、韩家鳌都挨打了，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我觉得清华的大学生在执行政策方面比我们差得远。

“八二四”事件使我感觉到，这种冲突在从下往上蔓延。在这事的前两天，我就跟王任重的秘书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央能出一个东西，来规范红卫兵的行动，因为很多学校还没有革委会，长期无人管理，非常容易出事。出身好的可以打出身不好的；学生可以打教师；一般群众可以打干部，大家都有打人的理由。他也说，你们的想法很好。

#### ◇ 《十点估计》

8月25号，在崇文区发生了李文波持刀砍红卫兵的事，这件事情一传出来，就出现了北京最厉害的打人高潮。这都是由于学生到社会上去造反引起来的。你不到社会上去，不去抄家，也没有这么多事情。

8月26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头一天晚上我睡得晚，所以第二天起得也晚。起床以后感觉学校人很少，比平常人少多了。我一到操场，发现有几个人在旗杆底下拔草，后面有一堆人围着打。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校卫队，他们在挡着，但是挡不住。我过去把那些打人的人都喝住，那时候我管打人的事情时都是非常严厉的。我把这几个被打的人带到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里，让校卫队的人看住。那天学校里学生出奇的少。我就问怎么回事？有人说，今天早晨有人传出这么个事儿，说崇文区有人杀红卫兵。熊刚在平常指挥上操的二楼平台上，发表了一通演说，说阶级敌人杀我们红卫兵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这一下，很多班都出现了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情。还有很多班出现了到清华大学去抄家，这些都是平常我们学校没有的事儿，以前都是不允许的。

我去了好几个班，有高631班，高641班，高643班，还有初中的几个班，哪个班打人，我就把哪个班喝住。从楼上到楼下，可能到了七八个班，都有打人的现象。那天革委会的委员们也不知都干什么去了，都不在，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一个人上下跑，也管不过来。于是，我决定让这些被打的人都回家了。

后来，孔祥瑛来找我。她以前是我的语文老师，是钱伟长的老婆。她说，大华，有这么个事情，钱伟长参加几个项目，都是国防尖端项目，现在他们随便到我们那里抄家，很多保密材料可能会丢失，这对国家不利，你看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个通告，就这样写：清华大学大右派钱伟长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全权负责，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擅自抄家。就是说，他们家的事我们管了。我记得是让徐桂荣去办的这件事。我还跟孔祥瑛去了他们家。那天正好初653班的人在抄他们家。钱伟长穿了个短裤站在家门口，书都搬得一地，抄这些书也没用啊，反正乱哄哄的就在那儿呆着。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他们说，我们要抄家。我说，他们家有很多都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抄家，你们赶快走吧。因为这个事儿，后来孔祥瑛跟我们关系很好。

我回到学校时，看到有些抄家的回来，搬了一大堆东西来。我问，谁让你们去抄家的？他们说，是熊刚让他们去的。抄家是乱抄一气，什么都抄，甚至把清华大学那家锂爱人的骨灰盒都抄来了。还有赵访熊教授的一个一万块钱的存单。我说，这些东西都应该还给人家。我特别生气地找到熊刚，他是宣传组的，归我管。我质问他，为什么让人去抄家？他说，他们都杀红卫兵了等等，我当时就宣布让他停职了。

晚上，红卫兵的很多领导，革委会委员都回来了。晓宾和小海是到王任重那儿去了，我问小海怎么回事，小海说是王任重叫他们去谈谈最近的情况。他们去谈了很多情况和我们感到担心的事情。王任重说，你们最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他提出北京新市委刚上任，但很多地方都在攻击新市委，清华也在批判李雪峰，希望我们支持一下新市委。他们在王任重那儿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说，正好，今天学校出了那么多的事儿。打人、抄家都出来了。咱们赶快要搞个东西，而且要搞得严厉一点，作为政策性的东西，不管是对我们学校，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必要的。

当天晚上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大概分了三四个人写这个东西，每个部分写完后，由我归纳了，有些部分我重写了一下。那天晚上搞到非常晚，可能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

我们写了这么几条，第一条，讲主流，其实就跟十六条一样。第二条，谨防把红卫兵打成反革命，也是跟十六条一样，十六条讲的是谨防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第三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把文斗、武斗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次讲的，要比《紧急呼吁书》中讲得多了。首先从理论上讲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不是说文化革命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所以武斗是完全不应该的。其次讲我们有强大的思想优势，就是政治优势，完全可以从政治上，把走资派、把敌人批倒批臭。不应该去打人，而且是坚决不能去打人，加了几个排比，文斗怎么样，武斗怎么样，就是在文斗、武斗问题上提的比以前多了重了，而且提了这么一条，就是把随便打人，提到军阀、法西斯作风这样的高度了。第四条，分清敌我，主要讲的是对学校的领导干部，不能一概以黑帮论处，这也是讲的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很多地方把学校领导都当成黑帮，都要打倒。这就叫没有分清敌我。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三类干部、四类干部分不清，一不小心，就变成敌人了。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慎重，搞不清楚的时候，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要轻易把他们当成敌人。第五条，讲左派内部的团结，我们针对当时很多学校都有两个红卫兵、三个红卫兵组织这种现象，我们提出，大家都是左派，就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应当防止突出个人，加强集体观念。第六条，团结大多数，这一条讲不光红卫兵要革命，学校大量的群众也要参加革命，要允许其他的群众革命。第七条，关于联系群众，我们在这里说，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把本校、本班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本校、本班的大多数群众团结好，红卫兵主要是在本校、本班活动，各单位之间的革命串连是必要的，但不要把这个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不要寄希望靠别人的支援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主要靠自己单位的群众，而且强调了一条，就是不要到社会上去。第八条是关于破四旧，形式上破四旧是容易的，从思想上、灵魂上破四旧才是难的。这主要是指形式上破四旧的偏差，随便剪人家的衣服呀，随便把东西砸毁了，随便改名字，这些东西不对。第九条，关于新市委，这是王任重要求讲的一条。第十条，红卫兵对十六条的态度，就是把十六条看成当前党的政策，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而且把它当作是真红卫兵还是伪红卫兵的分水岭。就是把执行政策，提到非常的高度来讲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把这篇文章搞完了，第二天，就组织所有的红卫兵学习讨论这个十点估计，当时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学校，拍了一张张晓宾领着学习的照片，登在8月30日报纸的头版。

我又对这篇稿子做最后的修改，并把文章题目定为：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

估计。我觉得叫呼吁书、十点意见什么的太多了，就仿照主席说过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采用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样的题目。后来，骆小海说我定的题目是“文不对题”，我说要是变成十点意见，就会立即被淹没在无数个意见中了。

第二天定稿后，两三个人打字，用四、五台油印机印了几千份。那天，晓宾通过他母亲，从铁道兵借了27辆大卡车，当天晚上，我们组织全校同学，能去的都去，到全北京市去宣传《十点估计》，这是我们最大的一次行动。头一天，我们学校出现了打人的现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第二天，我们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行动。

那天晚上，我直接去了东安市场，门口有两个站岗的，不让我进去。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他们听说是清华附中的，还比较尊重，就让我进去了。里面第一个摊位正在审一个私营房产主，让他跪在那儿。那些红卫兵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派出所提供的名单。我就把跪在地上的人叫了起来。另外给了他们几份《十点估计》，说，你们可以看看这个。

回来路过帅府园中学，还有灯光，我就进去了。看见好多人都在教室里坐着，我就问怎么会事？一个小孩说，我们犯错误了，我欺负我们班女同学了。红卫兵要批判我们。还有的说是因为家里的什么事儿。有一二十人被圈在里面。我说，你们搬个凳子到操场来。我就跟他们讲，现在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这场运动，你们都还年轻，还小，不管你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今后，都应该端正态度，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然后，我就把《十点估计》发给他们几份。并对他们说，大家今天晚上就回家！他们开始有点不相信，我又说了一遍。那帮小孩高兴得直喊“红卫兵万岁”。我对他们红卫兵的头儿说，这些孩子都还很小，他们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把他们都圈着？然后，我也发给他们几份《十点估计》。

#### ◇ 关于几起自杀事件

8月份，清华附中发生了几起自杀的事件。关于这几件事情，王友琴（10）在《清华附中模式》这篇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她的描述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在这里，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经过介绍一下。

8月8日那天晚上，高652班有人来找我说，杨爱伦失踪了。原因大概是下午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后来她就走了。开始大家都没太当回事，以为她回家了。晚上，五道口派出所来电话，当时是袁东平接的。派出所说，她被火车撞了，现在在北医三院。袁东平马上就去了。文革开始后，医院基本上都有规定，凡是自杀的，如果没有证明，一律不管。袁东平到医院就对杨爱伦说，你不要悲观，你还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不会有人对你怎么样的。杨爱伦自己也哭了。

我第二天早上也去了。去了以后，杨爱伦还挺紧张，我就把杨爱伦的姐姐叫出来，问她情况怎么样。她说，现在稳定了，昨天袁东平来过了。我让她告诉杨爱伦，不会有人把她打成反动学生的，她不在这个范围内，让她好好养伤。我还专门找医生说，她是女孩子，她脸上划破了，手轧坏两个指头。脸上的伤离发际比较近，说把她这个伤口尽量往后靠，这样以后留长头发，就可以把这个伤口挡住了，就不破相了。她的手的问题也不大。她姐姐就去把这些告诉杨爱伦，然后她出来说，杨爱伦特别高兴，说她特别感谢你们，说她特别支持革委会。但是她也说了，她反对邝桃生。后来我问过邝桃生，邝桃生说他不记得说过杨爱伦什么话，他说他没有注意过她。

王友琴的文章中说，有一个革委会委员主持批斗了杨爱伦，这根本不可能。文革说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们相互之间贴大字报的很多，有时用的语言也非常严厉，比如说“资产

阶级臭小姐”什么的，贴大字报的有的是红卫兵，有的不是红卫兵，都不代表什么组织。杨爱伦可能和他们班核心组的关系有点紧张，但从革委会来说，像她这样的学生，绝对不会去斗她的。8月9号，我跟高652班的人也讲了，以后处理这类问题，一定要更谨慎一些，不要去吵架。我当时的感觉，我们在学校是代表全体同学的，任何一个同学受伤了，我都有责任。

8月27日晚，我们上街宣传《十点估计》后回到学校，就听说了刘树华自杀的事。我问是怎么回事？刘长生老师说，可能是有学生打他了。我问是什么人打的，他也不太清楚。我们在接管学校权力的时候，很严格地遵循这么一条，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分开的。包括选进革委会的老师，他们只管老师的事儿。而老师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参加。那几个学校领导，我觉得在工作组的时候，该批判的都批判过了，该斗的也都斗过了，揭发批判的材料早都超过他们实际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是一条，等待运动后期处理。

刘树华原来是分团委副书记，可能因为生活问题被人告了，所以学校领导停止了他的工作，让他进行劳动、反省。从文革前那个学期开始，他就已经不在学校教课了。文革初期，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产生分歧后，有人问刘树华的态度，他还是坚决站在学校领导一边的。我听说，他后来被打，可能也和这个有关。一些学生觉得是受了他的影响，成了保学校领导的保皇派，心里有气就打了他。

从红卫兵的领导、主要的红卫兵成员，没有打刘树华的行为，也没有组织同学去批斗老师。但是，当时我们对学校的控制是有限的。那时候，打人被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我们有时候把它讲得很严重，但是打人的人，还有其他的人，都不认为打人是什么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几次呼吁不要打人，但总的来说，我们对打人这个事情，有些事情是我们控制得了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当时整个政治形势给一部分人的压力特别大，有一些老师、一些校领导，被同学打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作为革委会来说，应该负责，我们都有责任。但我们不是有组织的，把发生这些事情说成是有组织的，是没有道理的。王友琴在她的文章里说，8月26日晚上，由我组织了一个大会，在那个会上，突然把刘树华给揪出来，进行批斗。这完全是杜撰。据刘长生说，是有人打了刘树华。但绝对不是像王友琴说的，是在我主持的大会上被打的。

我们学校的老师成分很复杂，像我们预科班，我们的数理化老师全是没摘帽的右派。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著名大右派的老婆，大右派的妹妹，而这些老师都没有挨斗，为什么要把刘树华这样一个各方面并不突出，犯的错误也不那么严重的人拉出来批斗呢？王友琴还说，因为我们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荷尔蒙很旺盛！这说明她已经找不到什么有根据的东西了，而在为自己的杜撰找理由，把荷尔蒙都拿出来了。

我们学校还有一件事，就是高二的的一个女生，叫郭兰惠。大约在8月20号左右，她母亲打来电话，说郭兰惠喝了来苏水，在医院躺着呢，你们赶快来救救她吧！我就把她们班核心组的周春晓叫来，我问她，你们班有个叫郭兰惠的吗？她说，有啊。我说，你们班有没有斗郭兰惠？她说，没有啊，郭兰惠是高三留级下来的，她跟我们班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基本上不跟人来往。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给她写过大字报，但从他们班核心组来说，没有想过要整郭兰惠。我说，现在她出事了，喝来苏水了，要赶快处理这件事。我怕她一个女生处理不了这件事，我又把我们班的申克美和王慧成找来，我专门对申克美讲，这件事挺重要的，希望你很好地把这件事完成，就一条，尽全力，把人抢救过来。什么原因，以后再说。

三个人上午就出去了，到东郊那边。他们赶到医院，由于来苏水腐蚀性很强，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医生已经把她气管切开了。中午回来，申克美跟我说，我已经把你交的任务完成

了。我们到医院就跟她妈说，你别着急，我们去跟医院谈。又跟医院说，这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希望医院尽力抢救她。医院说，我们已经在尽力抢救她。然后他们问她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妈说，那天一回家，就看见她躺在那儿了。周春晓说，她在学校没有出现什么反常的情况，会不会在外面有什么流氓啊什么的？申克美说，她妈过来就把郭兰惠身上的被单揭开了，说，你看，她现在还没有发育呢，乳房还很小呢，她不会有什么流氓活动的。申克美是个男生，他说：我当时不好意思，不敢看，但是我还是跟她妈说，我们就是了解一下，看看可能还有什么其它原因没有。

王友琴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惠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惠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这件事是我亲自处理的，参加处理的有三个人：申克美、周春晓、王慧成。他们怎么处理的，回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不知道王友琴是怎么了解的这件事？她问过我们这些参与处理的哪个当事人了？如果没有的话，她文章里写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王友琴文章里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到贵阳打了多少人。这些事情在此之前我闻所未闻。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主张红卫兵到外面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研究历史关键是证据，如果听风就是雨，什么材料都敢用，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研究历史，结果肯定是南辕北辙的。

我们学校在后来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还死了一位赵晓东老师。他是体育老师，上课很认真，对谁都挺严厉，很尽职。在文革初期，他没有做什么事。结果就因为他的儿子参加了红卫兵，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有一帮人专门去斗他、打他，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就从教学楼上跳下来，脑浆迸裂而死。王友琴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件事，但因为此事牵连不到红卫兵，恰恰相反涉及到反红卫兵的一派人，于是她就语焉不详了。

#### ◇ 关于血统论

关于“对联”在清华附中的影响，应该说很多人受到它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对这个对联持不同意见。我就反对这个对联。所以8月6号那天在辩论会上，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我们要说话，首先就是不许打人，要约束红卫兵的行动。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批判这个对联，也不会因为这个对联的问题一下子把很多人都得罪了。但我们觉得应该转移对这个对联的兴趣，应当更多地提到政策，团结更多的人。对联这个事情，后来被极大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对联应当说是长期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路线后，必然出现的一种情况。如果不出现对联，也会出现别的东西，来高度概括对阶级路线的看法。另外，这个东西一出现，就处于一种被上面批判的地位，江青、陈伯达等都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对联。如果仅仅作作为一种情绪的发泄也就罢了，如果你还要提高到理论上，每天都在强调，我认为只能起坏作用，不能起好作用。所以在辩论对联的这个会上，我们提出这是个真假红卫兵的问题，要把那些随便打人，随便抄家，随便去剪人家裤子的人，作为假红卫兵、伪红卫兵、伪红旗，清理出去。

有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是熊刚起草的。他写的这个东西，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它。他跑到清华礼堂去宣讲，讲讲也就罢了，他还让人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还散发了。那时候我就暴跳如雷，问熊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搞出这么个东西来！他说，我用的是齐向东的名字。我说，那也不行！他是一种宣泄，在阶级路线问题上一种情绪的宣泄。

王友琴在谈到清华附中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是她想当然了。她的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而

且我们班和其他班的红卫兵中都有一些非“红五类”子女存在。我们有一个《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因为来我们学校的人很多，经常要回答有关红卫兵组织的各种问题，我们觉得有些政策问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口径，于是就搞了这么一个问答，里面明确讲到，红卫兵不唯成分论。里面还提到，红卫兵暂时起到共青团的作用。

王友琴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和“黑五类”这种新概念新名词。这个发明权绝对不在我们这里。到底是谁发明的，我也不知道。

1966年8月，我们把学校改名叫红卫兵战校，当时是我提议的。这确实是头脑发热。之后，很多学校写信来要求作为我们的分校。在许多要求做我们分校的来信中，我们选择了一家，就是曲阜师范学院。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在那里，他们就领着我去了孔府、孔庙、孔林。正好孔府马上就要关门了，正在拿三合板作防护板，要把孔子像保护起来。我当时很同意对这些古迹进行保护。后来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人到曲阜造反的消息时，我是哑然失笑。他们到底是左派，我们到底是右派。我们在那里是完全支持对古迹进行保护的政策，他们去了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曲阜人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同意进行保护的，那是他们当地引以为豪的东西。初期大规模的破四旧也没有破坏这些古迹，只是到了后来，谭厚兰他们去了才真正对这些古迹进行了破坏。

1966年的8月份是跌宕起伏，几乎每天都很紧张，都发生很多事情。我的想法还是这样：每个学校，包括每个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搞好你自己学校的事情。对外面的事情，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参加。对当时八中红卫兵取消民主党派这个事儿我们也很不以为然。他们刚搞完这个事儿，我们的《十点估计》就出来了。这是党经过很长时间总结出来的统一战线政策，怎么能那么随便就取消了呢？我们对这种想法不可理解，觉得就像提出红灯行、绿灯停一样非常可笑。

#### ◇ 南下武汉

9月初，王任重向我建议，你们可以到湖北去看看。你们都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去看看有好处，给他们提提意见。

我们大约在8、9号去的武汉，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接待我们的是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叫单一介。他来了以后很客气，说，任重同志经常提到你们，你们文化革命搞得好，下午就安排你们和湖北的左派朋友见一见。下午我们见了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王三宝在武汉很有名，是当时武汉中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他所在的武昌实验中学，文化革命中改名叫武汉红旗中学。见面也就是随便讲了几句客套话，没有什么具体的活动。

第二天我们到了武汉大学，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大学，在东湖旁的珞珈山上。我们看了很多大字报，其中就有宋彬彬她们写的公开信。那几天，我们还去了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测绘学院、华东农学院。我记得在几个会上，我还讲了话。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介绍红卫兵成立的情况，二是讲在运动中要注意政策。

9月14日，湖北省领导人在洪山宾馆和北京来串连的学生见面。首先是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讲话。张体学很动情，他说，他实在不理解，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会被炮轰？他讲他个人的革命史。他家里穷得叮当响，从小跟着母亲要饭，走遍了湖北所有的地方，实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他还讲了湖北省委的情况，说湖北省委解放以后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的，毛主席每年都到湖北来，都要亲自做很多具体指示。



张体学在讲话中说，他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控诉从北京来炮轰湖北省委的“南下一小撮”。张体学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我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我控诉你们，你们不是在炮打我们，你们不是在给我们抹黑，你们是在往毛主席脸上抹黑！

张体学讲话时，周围站了些维持秩序的水果湖中学的学生。去开会的学生全国各地的都有，但以北京的为主，很多人持炮轰省委的态度。开始我们就是想听听。后来，双方发生了争执，我和骆小海就上去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和小海先分了一下工，小海先讲湖北省委的成绩。

骆小海刚讲到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张体学立刻站起来，特别激动，一边搂着小海，一边搂着我，说道：“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湖北省的记者在旁边不断地照相。

小海讲完以后，我就讲，即便革命的省委也应该欢迎群众炮轰司令部，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这样炮火的洗礼可以变得更加纯洁，革命的队伍变得更好，不革命的那部分就会被打掉。我讲的这些他们并不反感，北京来的学生也不反感。觉得我们讲得还比较好。

我们认为湖北的情况有些不好，对立情绪非常大，有可能发展到武斗。我和骆小海当天就向张体学告别乘火车赶回北京。当晚我们到王任重那儿去汇报情况。我说，湖北的情况，我们觉得省委几个同志对运动都很不理解，很被动，对群众主要是太害怕。怕他们否定省委成绩，怕他们否定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必害怕，让他们说呗。我建议任重同志应该做做张体学同志的工作。王任重说，你说得很对，那天开完会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我已经对张体学同志说了，你要挺住，要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

我们对王任重讲，可能会出现武斗的情况，希望中央文革注意这种动向。那时候，我们觉得到一个地方，提意见可以，炮轰可以，但不要搞过激的行动。有的人一到那儿就静坐，就是骂，也没有什么根据，上来就要把人打倒。我们觉得这种行为就应该规范。湖北省委就把我们的《十点估计》印成大大的字，贴在省委门口。一边是十六条，一边是《十点估计》。

第二天，我们就从钓鱼台直接再去湖北，希望把这事再跟张体学沟通一下。到了湖北以后，我们写了一个《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访汉声明》。其中说道：我们诚恳地希望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担起责任来，接受批评，检讨错误，纠正错误，正像十六条所说的那样：“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希望省委深刻认真理解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敢字当头，谦虚谨慎加以得力领导，使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 ◇ 两面角色

10月的一天，清华大学的贺鹏飞到中南海去汇报，打电话叫我们参加。大概王任重已经出了状况，陈伯达要了解他和我们的联系问题。我从广州回来后就没有和王任重联系过。王任重和清华大学的联系还比较多，他的女儿也在清华，但她和贺鹏飞他们的筹委会不是一派的，意见也不一致。我们从来没有和他的女儿接触过。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依附于任何人。

会上，我大致说了一下情况，例如在8月13号的大会上见到了王任重，关于我们学校革委会选举情况的材料，《十点估计》，还有一个关于红卫兵发展的几点设想，准备搞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以及去湖北的情况，这么几件事。

陈伯达听了摇了摇头。我问他，这几件事你们是不是知道？因为与陈伯达沟通不是很容易，还要通过王力的翻译。陈伯达说，我们不知道。后来我回忆，我亲眼看到过王任重写的批语，将我们的几个材料转给毛、林、周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传阅。都是作为文革简讯这类文件发的，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也是我们和中央文革产生裂痕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是在1966年8月份，我们曾经接待了一次由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美术家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原想来参观故宫，结果故宫被封了，什么都没看到。他们说，那我们见见红卫兵行不行？对外文委心里没谱，他们一个副主任打电话问我，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接待吗？我说，试试呗！那天我们去了七八个人，在北京饭店，谈得还挺热烈。像红卫兵都是什么人组成的、红卫兵是怎么回事，反正讲得也挺可笑，但是气氛很好。

陪同接待的对外文委的同志非常高兴。他们说，你们接待得非常好。

“十一”时来了很多外国代表团，左派、右派来了很多人，都要见红卫兵，见红卫兵就成为了“十一”期间的一个活动。对外文委觉得我们第一次接待搞得不错，后来就将很多代表团派给我们。

我记得接待的外国代表团有墨西哥的代表团，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率领的代表团，奥地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澳大利亚的，还有日本妇女代表团，日本记者代表团。接待日本记者代表团前，对外文委打电话来说，他们可都是日本主要大报的记者，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提问都是最刁的。结果他们来了以后，问了好多问题。反复问，刘少奇怎么样，邓小平怎么样？那时候我们也不便直接说，就说，这些事都是党内的事情。有的记者问，某某人现在看不到了，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凡是你们可以看到的東西，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凡是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你们也不会看到的。

当时是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学校的人不多，谁回来就把谁拉来参加接待。当时有两方面的接待任务，一个是接待外宾，还有一个是接待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从那时，我们就扮演两面角色。对着外国人，我们是左派；而面对国内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了右派。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整个文革的形象；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已经在打鼓了。

中央文革的很多东西使我们开始产生不满了。一个是王任重这个事情，另一个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有意思，第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反对过的东西，一个过去时态的东西。什么自上而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里说的，说得很尖锐。但在我们来说，跟工作组的所有矛盾，我们就是通过一次批判胡克实的大会就解决了。就是这么多事，并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如果再把它拿回来批一遍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的想法。第二，有人拿这个东西反而打在我们头上，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是反对工作组而得到主席支持的，我们怎么反倒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就是6月份半个月，7、8、9三个月。9月我开始出去串连，10月回到北京，10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那时起，我完全失去了目标，开始转向了。10月间，我们一半是左派，一半是右派。对外，我们在维护整个文革的形象，又碰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新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觉得我们和文化大革命非常合拍，有时候是心心相印。但是从这以后呢，我们觉得越来越不合拍了。我们不知道怎

么做，手足无措。

还有，中央当时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传出来毛主席的讲话：北京太文明了，匆匆忙忙的发紧急呼吁书，匆匆忙忙的开十万人大会，匆匆忙忙的改组团中央。这对我们参与的这几个活动，特别是对我们的紧急呼吁书和《十点估计》都予以了否定。其实，9月5号，《人民日报》发了个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专门提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说明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当时就应当很快制止武斗这样的事情。

现在新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极力反对的事情，反而说到我们头上来了，你们镇压学生，你们打人，这一连串的东西出现，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

#### ◇ 形势逆转

之后，我们第二次去串连，从山东到上海，再到江西。一路上，所有地方的省、地、县三级领导，统统被炮轰，无一例外，无一幸免，所有的负责干部都要被批斗。

那时候我还写日记。我曾写道：我感觉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看不清方向。这日记本后来据说被“井冈山”的人弄去了，因为他们在一篇大字报中批判我，“在串连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从庐山下来以后，原计划是到井冈山，我觉得心情很不好，执意要回北京。结果是任冉齐和我一块儿回了北京。

回来已经大不一样了，学校里已经出现新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久，“井冈山”也成立了，他们和清华井冈山的大学生挂得很紧。他们采取了行动，把革委会抄了，把当时革委会的印章拿去烧毁了。

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放了刘少奇一马，说他检讨得好。这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坚持的一些东西还是对的。没有把文革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看成是一种思想教育，只是在少数领域，就是主席讲的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少数几个上层建筑领域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没有觉得整个党内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包括对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也认为这是一种带戏谑成份的、为了引起注意或敲响警钟而使用的夸张语言，并不是党内真的就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中学的红卫兵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在所有的领域，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领域，发动全面的进攻。10月份是大学的造反派最活跃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的这些工作组，全是各部委派的。他们通过批判工作组，就把他们的触须、他们的矛头伸向了所有的部委。一下子就变成了全面开花。这时期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目不暇接：这边地质部出事了；那边闹到国防科委。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有很多过分的地方，都把一些过去没有提出过的事情公开出来。

这个时候，我对这个运动再往下搞什么？依靠什么人来搞？已经开始产生疑问了。

特别是对中央文革。我们在两重意义上与他们渐行渐远。第一是过去他们有一个联络员——王任重，和我们联络，包括我们的事情也向他汇报。王任重突然被说成是他个人跟我们联系的，中央文革不知道，于是这种联系中断了。第二个是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想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每一次讲话，我们不再是感到很兴奋，而是觉得他们很多话讲得太轻率了，有些是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就造成我们在思想上跟中央文革有距离感了，对文化革命出现的各种现象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对“斗、批、改”，我们认为文化革命就是“斗、批、改”三个阶段，而我们已经到了改的阶段了。然而突然发现，人家连第一个“斗”的阶段还没过去呢！不断地要揪出新人，而且每次都是拼命去把人揪出来。起码你得去找出人家干了什么坏事才行，不是为了揪而揪，这算什么？我们很反感。

有些人，说这种反感是保爹保妈造成的，这有点太简单化了。从保爹保妈的角度来讲，我就不应该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造反，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文化革命也受到一些冲击。原来我觉得这种冲击是应当的，是教育等领域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受的事情。没有觉得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到底谁怎么样，最后总会弄清楚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揪的方式，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互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了。文化革命开始变味了。

#### ◇ “联动”的诞生

每当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像抢档案啊、武斗啊，中央文革总是表示一种支持的态度，说什么“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每次都得到夸奖。而且这个时候，大学生成为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后，就显示出一种互相联合的趋势，先后成立了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行动已不再是某一个学校的单一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也失去了我们说话的权利，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儿表达我们的意愿。所以这时有人提议，中学红卫兵联合起来搞个组织，我们认为可以一试。通过这个办法，我至少可以发言，可以表达我们的意愿。

其实在此之前，天气还比较热的时候，北大附中就联络了一些学校，想成立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十几个人去北京展览馆参加了那个会。不过我发言表示不同意成立这样的组织，认为一个学校里存在两三个组织的情况下，你是收一家还是都收？不收的话，就会引起矛盾，收这个，不收那个，都不好办。当时我的想法还是，左派应该团结。那时，大学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除了中学的老红卫兵中的各个派别以外，造反派红卫兵还很少见。我觉得我说服了他们。后来有些人因此还对彭小蒙有意见，说，原来我们是要开成立大会的，怎么让清华附中的一搅和，就变成筹备大会了？实际上筹备大会后来也没有了。

12月5日成立“联动”的时候，我在外面串连还没回北京。回北京后碰上了北大附中的宫小吉，我们聊了几句。他那时候正在起草“联动”的宣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但我们不是很积极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宣言搞出来以后，我到北大附中参加了一次会。内容是筹备一个大会，第一是联动向社会正式亮相，第二是想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要使我们和其他的组织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时准备了几个发言。我是肯定跑不了的，而且我也是有些话想说。对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做一个总结，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文革初期过分强调阶级路线、阶级队伍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合时宜，而且造成了学生中间的分裂，我本人觉得也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打人，虽然我们没有去鼓吹对联，但是我们确实过分地强调了阶级路线等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大会就叫“破私立公”大会。当时准备有我们学校的发言，还有北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发言。我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会前，我还得到一个信息，说戚本禹去了北大附中，与周春英等几个人有一次谈话，其中专门谈到我们12月26号准备召开大会，想请中央文革的同志参加。戚本禹说，好嘛，我们争取去。看来上面也

认可这件事，因此我们就更加认真地去做准备。

这时，有的学校红卫兵到西直门城楼贴出大标语，说“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打乱了我们的步骤，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某种认可，而会前自己就去讲什么“逼上梁山”，我们自己的行动就有矛盾了。

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我从不同意到同意，主要是想取得说话的权利。因为我们不认可文革当时搞的那些东西，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也应该有发言权。

当时我们学校红卫兵内部，就是否参加“联动”这个事儿，开了好几次会讨论。高一的有一大部分人不同意参加。这跟我以前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的行为负责，别的学校有好多红卫兵打人、抄家，我们参加的话，就和他们一样了，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一种态度。但在，我觉得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来表达我们的意愿。会上，还是像我这种意见的人多，但是在领导层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比较坚决地持参加“联动”的态度。其实，选择不参加是一种更明智、更实际、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

12月26日开会那天，一进门，“红后代”的传单就给我了。我看了以后对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弄出来。他们听了也不吭气。

我们在后台，准备着依次发言。有两个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好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大会由周春英主持，按程序进行。我们问那两个联络员，中央文革谁来出席这个会？什么时候来？他们说，快来了。他们也确实去打了几次电话。现在我们知道了，那天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吃寿筵了。但问题是：他们是先决定要来，因为临时通知去毛泽东处吃饭而没来？还是根本就没打算来？他们不来，我们没法开会。可是等了半天，不能再等了，所以就开始开会。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那个会没有请外面的人参加，没有邀请什么“三司”等造反派参加。整个大会也就少数几个组织者知道要干什么，大多数人是到这里宣泄来了。本来我们期待在这个会后，跟中央文革他们有一次对话。结果他们压根儿就没来。我发言后，中央文革的人还没有来。最后，苏振生、马小军他们几个不干了，就冲上台去了。我说，我也不管了，讲就讲吧。他们一念那十几口号，全场就沸腾了。

最后他们上台喊的口号，是这些人形成的精神寄托。也就是说，整个“联动”，它的宗旨，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什么“血统论”。“联动”这样一个汇集了几万人的组织，公开打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号，全国也就只此一家。于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就把“联动”打成了反动组织。

“联动”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提出了与当局不同的政治主张，要求按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主张来搞运动，全国不能再乱下去了，干部大部分是好的，这是一个总的基调。也就是现在人讲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不同之处。按老红卫兵的说法，就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域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而且干部的大多数是跟着毛主席的，是革命的。而造反派呢，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已经产生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进行这个革命，就要把这部分人全部革除掉，把这个政权的绝大部分要加以改变。

“联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

## ◇ 冲公安部

12月26号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中央文革对“联动”采取了非常手段，通过国家机器，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摧毁。12月被称为“12月黑风”，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冲”公安部，我去了。那是12月17号，因为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两个人被北航“红旗”的人抓走，扭送到公安部。具体什么情节，怎么送去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条是，北航“红旗”把人扭送到公安部，而公安部就收下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原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抓，去扭送，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你公安部是不是都收？所以当天北航附中的岳小东来找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没有二话，我们立刻就去了。

我们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大附中的人在公安部的接待室跟他们吵，还没进去。我们到了就跟他们说，不要跟他们吵，就找公安部的领导。

后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说，你们不要都来，选几个代表来谈。我们推选了9个人，有我、张晓宾、邝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人。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一看，他们有11个人。我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结果他们退出去两个人，9个人对9个人，谈了一晚上。

当时公安部的人真是理屈词穷。从原则上他讲不通啊。有违法行为的，你们可以抓人，但一个群众组织扭送一个人来你收下，这就不对了。我们这次去跟公安部的谈判，就是所谓“一冲公安部”。其实我们是非常有理、有据。毛泽东以前的讲话，专门讲过不能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我们就是用毛泽东以前的有关讲话来反对这件事，并把它提到很高的政治高度来讲。讲原则嘛！我觉得那天公安部和我们谈判的几个人，很尴尬，很难受。谈判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但后来被抓的陈公坊很快就放出来了。这事大家都很愤怒。

12月，许多学校都出现了造反派的红卫兵，他们对以前的老红卫兵进行批判。老红卫兵以前有压制学生的情况，造成了学生的分裂和对立，后来出现的这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联动”的事情还没开始，矛盾就已经很激化了，不仅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事情，而且有国家机器介入了。

我们学校也出事了。我弟弟卜伟华他们班几个人到清华去贴“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结果清华大学井冈山的造反派把我们的办公室给抄了。他们还把以前学校封存的那些档案，两个柜子都扛走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们要东西。我说，你们干嘛？打家劫舍啊？他们几个人去贴大标语，你们抄我们革委会干什么？当时他们已经看过了里面的东西，觉得没什么用，就说，那你们拿回去吧。我说，我才不拿回去呢，你们怎么拿走的怎么给送回来！

12月25号，清华井冈山出动了5000人的队伍，在北京市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时报纸上都还没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他们执意要把这个事情公开推到社会上去。12月27号，北大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也是打倒刘邓。他们都在竞相表演，都想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

12月26号，“联动”开了大会，标志着在政治上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了。当时只有我们采取了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但没有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反而是更远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过18岁左右，我们与中央文革之间划了一道很深的鸿沟。1967年的元旦社论虽然又提到“最开始的红卫兵”如何如何，使我们感觉到中央可能还没有把我们遗忘，我们可能还会有说话的机会。

没几天，王力、戚本禹突然不期而至来到清华附中。来了以后，先到井冈山那边，然后又说要看我们，来到我们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戚本禹说，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战斗的友谊，现在呢，我们希望还能够保持下去，希望你们还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地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

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些“井冈山”和其他组织的人。有一个人说，请问戚本禹同志，什么是革命群众？戚本禹说，你就是革命群众。那个人继续说，那他们为什么说我们不算革命群众？我说，没有那么回事。我们红卫兵写了《紧急呼吁书》，我们是反对打人的。戚本禹说，你们反对打人，为什么还要绞死蒯大富？有人插话说，王任重是他们的黑后台，他们受王任重操纵。我说，王力同志在这儿，他很清楚，我们和王任重有过什么接触，我们都向他们做过汇报。王力保持沉默。

王力、戚本禹走了以后，我们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井冈山”把王力和戚本禹的讲话整理出来，贴在教学楼门厅里。并且还贴了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好！好！好！”我们红卫兵就针锋相对地贴了一个“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糟！糟！糟！”另外还贴了一条：“王力、戚本禹，像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之后，许多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先后被砸、人员被抓。有一天，有两个人来找我，筹备召开炮轰公安部的大会。1月10号，我们在展览馆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我们在文革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公开提反对哪一个领导人，只在这一次提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我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搞了一个“最后通牒”：限公安部于48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这个通牒不是我弄的。

12号晚上，我们都去公安部看了。那次去的人特别多，整个长安街上都是人，中央文革也动员了很多人去保卫公安部。

（未完待续）

注释：

9．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时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

10．美国学者，发表了多篇关于文革和红卫兵暴力研究的文章。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